



Mentira

Enrique de Hériz

谎言家族

〔西〕恩里克·德·埃里斯 著  
江慧真、奥斯卡 译

# 谎言家族

〔西〕恩里克·德·埃利斯  
江慧真、奥斯卡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谎言家族 / (西)埃利斯著; 江慧真, 奥斯卡译  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2  
ISBN 978-7-208-10715-1

I. ① 谎… II. ① 埃… ② 江… ③ 奥… III. ① 长篇小  
说—西班牙—现代 IV. ① I5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6336号

责任编辑 陈欢欢  
装帧设计 张 布



世纪文景

谎言家族

[西] 恩里克·德·埃利斯 著

江慧真 奥斯卡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  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 
(100013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)  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 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  
印 张 13.5  
字 数 295,000  
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 
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 
I S B N 978-7-208-10715-1 / I · 1012  
定 价 38.00元



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

死亡？我死了吗？死的是别人吧，我要说的还不止这句话。我现在身处加勒比海旅馆，一个半月来，几乎没看到半个人影。不过，这是个谎言，因为，每隔一个星期，安基耶会帮我送粮食过来。虽然我的时间观念不太可靠，但我想，是每周二吧。这儿日复一日，每天过得都差不多。

加勒比海旅馆，很普通的名字。六间长方形的茅屋，围着一间最大的正方形茅屋客房，中庭有着餐厅和管理中心的功能。每间茅屋都有着棕榈叶的屋顶，粗壮树干围起来的墙直达半空中，上头还装了片硕大的玻璃，只可惜蚊子太多，浓密到光线几乎穿透不过雨林。雨林里老是灰暗无光，这就是位于危地马拉北方的佩滕雨林，距离加勒比海非常遥远。

我花了十个小时，从伦敦飞到迈阿密，又耗了两个钟头，飞到危地马拉的首都，接着，换乘小飞机，飞了五十分钟来到弗洛雷斯市，沿着陆路，我乘坐了六十二公里的货车，才抵达萨亚赫切。以我这把年纪来说，这趟行程还不算太差。来到萨亚赫切，全得和船夫搏感情。花钱事小，累人的是要耐着性子和人打交道，这些我统统交给安基耶去打点。我对他印象好极了，‘他脸上始终挂着旅游从业者的招牌笑容，那种介于权威和嘲笑之间的味道，让我感觉起来既严肃又负责。在他缜密的规划下，我也连带受到影响，决定直接挑他的船，这看起来比其他人的船稳多了。当地人称呼这种海上工具为小

艇，但全都是电动船。安基耶的小艇叫做娇生惯养，如果不是因为大家的船名太相似了，否则还挺好记的：例如娇生惯养、忘恩负义、妒火中烧、沉默寡言，诸如此类的。要是我的心情好到对这些名字感兴趣，我铁定会仔细研究它们的由来。比如说，谁先取了第一个名字，为什么要这样取，谁抄袭了谁？以前的我，绝对会调查得清清楚楚。

在这儿，不管你挑中哪一只小艇，你所付的钱，最后都会回收到同一双手上：老头家。我猜他应该有名字的，只是我不知道叫啥。大伙都喊他“老头家”，从我一来到萨亚赫切的每一个动作，都得间接经过他同意。我从未见过他，但我知道，一切都得有他的允许才行得通，包括该收多少美元，特别是安排这种只容纳二十人以下的顶级旅馆。

这只娇生惯养是铝金属打造的，带着墨绿的色调，我推测，以前应该隶属于军队。船身共长两米半，我怀疑，这只船是否挤得下三四个人以上。安基耶老坚持一次要载上七到八个人之多。几乎每次见面，他都要重复说，所有河面上的船，就属铝制船最有优势，其他的船都是碳纤维所制，虽然和他的船一样轻盈，操控性也不错，却脆弱多了。要是遇到强烈的撞击，不会只是凹进去，而是直接像干掉的甘蔗般破碎开来，尤其是老旧或有裂痕的船只。我向他解释说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少数的木船。他回答，现在已经没人要那种又重又不实用的船了。我仍然坚持，还是有的。要是换成我人生另一段时期，我会告诉他关于船和海、意大利蒸汽船和帆船，所有我知道的关于海的事情。我会告诉他我的人生、我的家人。但现在，我不会。我对他微笑，偶尔坐下来，好像真的很在乎他的话。其实，我根本不在意，这不是我的错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让我觉得重要的事了。

安基耶带我来到这儿，我给了他十八美元。我猜，他大概只赚五或六美

元，其他都被老头家拿走了。我不知道我们在热情河上行驶了多少公里，我只知道，船的速度不但快，还走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是安静的、无边的、广阔的河床，绵延近三十米。随着我们渐渐远离萨亚赫切，两岸的植物变得越来越浓密，首先是平原，接着半平原，然后是灌木，最后迈向了雨林。泥泞且沉重的河水，几乎无法映照出天空泛红的倒影。突然间，河流交叉成两个孪生手足，安基耶选了右边的水路。很快地，浮游植物开始浮现，一开始是些零星的睡莲，接着一束束浓密地聚集出现。一转过拐弯之处，露出了几座小岛。是真正的小岛，不管是竹子林立的小岛，或者是其他，都越显如此苍郁而茂密。摇曳的水仙、三米高的甘蔗，各种水生植物和浮游的丛林交错着。突然间，安基耶驾着娇生惯养的船头，转向小火山岛群中的一个，以飞快的速度前进。一开始，我以为他只是想让我开开眼界，或是像个突如其来的朋友般吓吓我。后来，在最后一刻，我看不出任何征兆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秘诀可以避免眼前的撞击，眼见只差三秒钟、两秒钟、一秒……穿过去了。

我们驶进了小火山岛。四周环绕着绿色浓密植物，船依然在水面漂行，一点也没有减缓速度。看来真不可思议，没有陆地，怎么支撑繁盛的植物？这些没有根的植物怎么长的？

说不定，安基耶以为我被眼前这般景色震慑住了，因为，我一会儿便转身背对着他，瞭望起船头远方的景色。根本不是！我在想自个儿的事。古老的回忆和近来的发现，让眼前的现在无足轻重了。一切都因为我装死，让我人生的记忆出现了一道不同的光线，显得越发清楚。那个俄罗斯女人，我想起俄罗斯女人。她花了我整整五天的时间，在伦敦找资料。事实上，我从很久以前就怀疑了：那个俄罗斯女人，活脱脱就是个骗子。我一点也不诧异，我早就知情了。令我惊讶的是马列斯毕纳村的人。我一点也不乐于相信她的

谎言，歌颂她的谎言，也不屑把谎言编成真正的传说。河上的第一次旅行，我花了很多时间想着她，没有什么恶意，也没想怪罪她。或许，追根究底，我们是同类的人。我们从容地面对死亡，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死了，现在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认为我已经死了。人们被断断续续的历史书籍审判，大声地审判，他们的形象就这样被放大。通过沉默，我们这些女人，在传奇传记的角落中相遇。俄罗斯女人就属于这一类。我也是，我猜。尽管是比较温和、安全的尺度，但是我的沉默，达到了足够的强度，让其他的人可以创造出一个小小的神话。前天读了自己的讣闻之后，发现儿女们并非那么了解我之后，我便开始这样想。

我也想起朱迪丝。现在朱迪丝已经死了，对，真的死了。我谈不上认识她，只不过和她讲上二十分钟的话罢了。从伦敦飞往危地马拉的飞机上，她坐我旁边。和我一样，独自旅行。和我一样，年岁不小了，也或许没我那么老。说不定才六十几岁，我没问她。事实上，我没问她任何话。我猜，我们对彼此的尊敬远大于好奇。一开始发现她时，我记得心里还想着：“这人看来和我真像，假如我去当修女，应该也是这个模样吧。”我从小读教会学校，认识好多这种模样的修女。就算有一天她们放弃了那些习惯，她们的举手投足还是会泄露出秘密：她们的人生，有一种非常具体而严谨的模式。朱迪丝不是修女，也从来没当过。她是护士，医疗无国界，但真奇怪，现在我才发现，我竟然没有开口问她打哪来的。听她的口音像是德国人，尽管她说着一口完美无瑕的西班牙语。她主要负责协调一堆不同的拉丁美洲协助发展计划，算是管理工作。她监督调整不同计划中所需药物的数量，同时组织紧急病人的疏散工作。她做这些工作已经有十五年了，但她没告诉我，到底做得开不开心。我看她做事情的样子，应该是开心的，所以才不需要昭告天下



吧。我也没问她是否有儿女。现在，我倒真想知道。到达危地马拉机场时，她的行李比我的先出来。她带着礼貌的表情和我道别，我揣想着：“又是个传奇人物！”一个孤单的女人，被寂静围绕着，就像那个俄罗斯女人，就像我。如果我正在写一本小说，我会说，那抹最后的眼神，串结起我们的命运，类似这样的说法。小说里总会出现一些好的句子，堆砌着描述自己的文字，来填满自己命运的重量，如空气般的命运。可怜的朱迪丝，最终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无法想像，每每想到她竟会有这样危险悲惨的下场。可怜的朱迪丝。

从里面看起来，火山群岛几乎一模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注意火山岛，环绕在旁的宽广水域便越来越窄。我有种感觉，我们迷路了。安基耶非常专注地看着前方，好像从那片浮动的丛林中间可以发现新大陆一样。偶尔，他从船头前方一块活动的树干来辨别，然后让发动机加速，避免撞上船的螺旋桨。不到一秒钟的时间，一个不假思索的姿势，好像一个人抬起脚，避免踩到路上的石头。船头迅速地甩开水面腾空，发动机的回音加上他的咆哮声，仿佛有一整列的小飞机，从我们头上飞过。

“我们迷路了，对不对？”穿过第 N 个火山岛时，我这样问。

“不，女士，我们正在贝戴克斯巴顿河<sup>[1]</sup>上。”

我不知道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航行，也不知道何时小船渐渐停歇。安基耶放慢速度靠近某个小岛，但这次他没再研究小岛，直接沿着边缘进去。我花了一会儿时间，观察到茂盛的岛屿下方，有着会弄脏脚的沙滩，我才明白，

---

[1] 贝戴克斯巴顿河 (Petexbatún River)：位于危地马拉北部的一条河流，源自佩滕省南部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这是坚实的、可以走在上面的沙滩，一片我不知道是什么陆地的岸边。安基耶关掉发动机后，一股无法形容的死寂笼罩着我们，他一口气跳上岸边，把娇生惯养的船头系在两根木头上面。

“现在怎么了？”我问，“出故障了吗？”

“不，我们到了，就是这儿，在那些树丛的后方。”他指着浓密的雨林间，差不多再过去二十米左右，“贝戴克斯巴顿湖就在那边，那儿就是加勒比海旅馆。”

顺着他指的方向过去，虽然茂密的丛林几乎掩盖了视线，我还是看到了第一间茅屋。

安基耶帮我把背包卸下来放在地上，做了个手势向我讨了十八美元，把钱放进口袋。然后，好像他的时间很宝贵似的，丝毫不能浪费在两段行程中间，他向我告辞：“祝您一切顺利，这是门房要给您的适用所有门的钥匙，收音机已经充好电，只要按下电源钮，调整频道就可以。我很确定您应该知道房间的床下面放有蜡烛，如果您需要什么东西再告诉我，我下周二会再来。”

急着把娇生惯养掉头，他马上拉动发动机，跳上船走了，消失在河流上方，留下一脸错愕的我。在所有行程计划中，他表现得如此节制，带一半害羞，或许还有些优越感，但起码没有哪个时刻是不快乐的。这么职业性的转变，让我想起了他的微笑，那种突然会透露出某种古老部落迷信的味道，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。只不过两秒钟，我就明白了。或者说，两步路的时间。在这丛林中迈开两步，就足够理解那个仓促告别背后的原因。蚊子，我的老朋友，上百万只的蚊子。我走回丛林外，从背包中拿出防蚊液，擦满脸、双手、足踝和耳朵。我并不怕蚊子，也不大害怕蚊子可能传染的疾

病。多年来，我已经学会和那些突如其来的溽热，还有连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热带高烧一同和睦相处了。我早已学会容忍，连抗生素都不吃。一切都为五斗米折腰吧。我第一次去非洲的旅程中，他们这样告诉我，我也更坚定了人生的方向。一个真正的人类学家，除了与高烧为伍之外，没有别的法子。面对疟疾，我并不藐视，也学会不害怕。我带了五罐防蚊液，太夸张了，整整一年也不可能用完。或许带那么多，是因为我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才离开，或者只是像瘾君子囤积香烟盒一样，担心有一天恐怕会戒烟。任何一种防蚊液都没用，至少必须带着浓度 40% 的灭蚊液。我甚至在巴塞罗那时也常常擦，擦一点点就是了，好像上流社会的人们，老爱在耳朵后面或者胸口前方洒上几滴香水一样的道理。对我而言，防蚊液的味道，就像生命中的香水，当我死时，旁人得在棺木里为我放上一罐，让棺木的感觉更贴近雨林，或让我缅怀生前的日子。我不能再写了！虽然现在心里这么想，但已经有点太迟，如果不停下来，孩子们一定会质问他的。质问阿尔维托。他们会问他，到底有没有在我身上闻到了什么，他是不是用这个气味认尸的。

不到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已经在加勒比海旅馆安顿下来。把背包丢在摇摇晃晃的旧床上，然后到公共澡堂，品尝着我前一天就按照菜单向饭店老板订好的伙食。东西不多，他们总是告诉我，我的食量比小鸟的胃口还小，这可能是真的。我猜，我的职业让我习惯节食。好多的白米饭。我光是用一点点通心粉和一颗大蒜就有办法为自己办个盛宴。对我来说，异国奢侈的食物，顶多是一颗牛油果，也是这个国家最丰富的特产。品尝完准备好的所有食物后，我靠近收音机，把它关了。尽管我不听，也不浪费任何一节电池，这也是职业养成的好习惯。或许该说，我之所以关掉收音机是因为干扰，不过，

这并非事实。我之所以零零总总写下这些，好处就是不用说谎，反正，也不会有人来读它。但我现在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写下来的东西，这些文字只是为了记录某些事情罢了。这一页页纸，不是真相的纪念碑，也不是展览台，而是下水道：是一个让我避开真相的地方。我关掉收音机，我是为了真相才来这儿，我是如此孤单，孤单而沉默。所以，当我想要打破沉寂，我就可以打破。我扭开收音机，和老板要了一些我要的东西后，又把它给关了。

我从不觉得过去很重要，如果现在要追究、要坚持调查造成不幸的原因，特别是，为何孩子们会允许这样的错误发生，结局恐怕就会像女儿塞雷娜一样。塞雷娜面对过去，好比玻璃窗上的苍蝇：上下来回飞着，不惜把头撞上玻璃。某次还因为试着想穿过玻璃而筋疲力尽。她丝毫没有察觉到，光线和玻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。可怜的塞雷娜，可怜的大家。我一想到他们，便充满了“复活”的念头，或说是“现身”。我发现自己陷入了荒谬的混乱，不过，既然我前天都没这样做，看得出来现在还有什么理由。我不知道。该来的，总是会来。

这并不是说，我对于他们的痛苦无动于衷。我知道，在我的手上结束了他们的痛苦。安基耶通过收音机的广播声找到我，把我安置在萨亚赫切，让我打电话出去，其实也没打给谁。我不需要离开，只消打一个电话给老板，说我现在很好就够了。但同时，我认为自己还是不应该出面，破坏这一出阴错阳差造成的完美戏码。事情演变实在太荒谬、太不可思议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毫无明确清楚的逻辑，没人注意到，更没人想负责。首先，或许这一切让我困惑，我一度梦到该去解决问题。旅程中，只要一有不顺心，或者被琐事牵绊，我就不想回去。这种情形不断发生，但我从来不敢真的做。我的消失将带给胡里奥和儿女们痛苦，这种恐惧始终笼罩着我。或许，现在会有所

不同，他们已长大了。我想待在别处，不代表我不爱他们，但给他们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的可能，却始终折磨我的决心。我承认，有一次我试着想要果断解决，但命运的转变照亮了我：赐我一死，无论对我或对孩子来说，都比较好，免去我回到那个越来越不像个人生的处境。他们……好，对我来说，我假设，一个母亲的死亡，远比失踪来得容易让人接受。因为我既没能力规划失踪的情节，也无法计划骗局。我不是这样的人，而且，就算我有能力，也是二三十年后的事了。要是现在，绝对不可能，而且也没道理这样做。很快，我就要满七十岁了。我捏造了一场死亡，已让我的生命所剩无几，过去发生的事，还算顺心如意，但不代表那就是我想要的。人生带给你的遭遇，往往不是你努力想要的。

基于种种理由，这个错误的发生反倒令我开心。死亡是我的专长，不是死人，而是死亡——应该说，那些由生者为死者做的事情。我几乎漫游了半个世界，接触各种痛苦的仪式，调查各个种族和文化中的男女如何面对亲爱的人离去。我出版过七本这方面的书籍，发表过数百篇论文和田野调查报告，以及各类统计资料。理所当然，我知道所有在世的人如何为死者哭泣着。假设我拥有机会，提供最后一份的死亡调查，绝对权威的论文，不可能有比这次更好的机会了。我活在自己的死亡中，却没有真正死去。我不止一次这样排练，我损失了葬礼的大笔礼金，我仅有的，只是凭空想像我是个怎样的人、身边爱我的人会怎么做、说些什么话。如果，有人因为命运的安排，想利用机会，在我举手之遥的距离内责怪我，我也会含笑接受。

还有一个理由，可别轻易忽略，我可能会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遇上这种事情。老实说，一场意外的、混乱的死亡，不见得只发生在雨林。但是，就是这里了，像这样的地方，在一两个月前，我还不认识这儿，但现在，我却强

烈感觉自己属于这儿，绝对生于斯死于斯。我搞不清楚为什么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解释这种感觉。

我在泪水中思念着孩子们。好像他们为我哭泣一般，好像他们现在还在为我哭泣一般。我不会拿孩子的眼泪，去测量他们内心的痛苦。我知道太多错误背后的故事了，哭泣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，每个人选择自己理解的方式竭尽所能地哭着。远在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<sup>[1]</sup>上，孟加拉湾的东南边，当地人举行葬礼时，人们声嘶力竭、不可思议地哭泣，他们用一种野蛮的方式，一边发抖一边号叫，身体仿佛要爆裂开来，眼眶不停地自动涌出泪水。他们因肺部剧烈痉挛抽搐而受苦，于是往往选择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，把这些足以震碎厚玻璃的喊叫声传送出去，如同受伤的野兽。早期探访这些小岛的人类学家完全无法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景象。他们回国后写下专业评论，把这些发现昭告世人。在那些充满了想像的假设推论中，他们确信找到了一个共同结论，那就是：如果失去的是自己亲人，这些岛民面对死亡的哀伤表达上，会比其他人更深刻而真心。后来，技术人员、无神论者陆续到来，这群人类学家带着相机、录音机来到小岛，挨家挨户记录着哭泣和死亡，仔细分析每个哭声。很快地，他们发现一种和家庭结构有关的解释，认定基于一种对痛苦的特殊概念，安达曼男人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、无法控制的哭泣方式。

这真是蠢极了！根本没人愿意花足够的时间调查出真相，找适当的时间挖掘必要的问题，但我却这么做，并不值得赞赏。其他人都是依附在庞大机

---

[1] 安达曼（Andaman）和尼科巴（Nicobar）群岛是印度的海外联合属地，位于孟加拉湾中，缅甸以南，距离印度大陆八百公里。

构下带队研究，为的是发表论文，一回来便马上公布，把那些资料、作研究时的照片统统公开，好像只有这种方法可以证明他们确实到过那些地方。那是人类学第一次繁荣的年代。公布奇怪的照片所带来的收益，远远大于了解真相的底层。我倒是不奇怪当时这样的真相竟然可以变成一门学说的工具，但是，若非现在不是个讨论的好时机，我能讲上三天三夜。但现在，因为我心中不痛快，所以我要讲自己的故事。

我是为了自由才出走的。人处在不利的处境中，劣势和优势偶尔也会玩起捉迷藏。和其他人相比，我显得更穷。前几次旅程，都是胡里奥付的钱。他卖了几幅画作，对我说：“这儿有一百万，你可以到想去的地方。”这就是胡里奥奖学金，我们都这样称呼它，如果没有这笔奖学金，我不可能去旅行。20世纪50年代末期，官方的研究奖学金会给一个西班牙女人人类学家吗？这确实发生在别人身上。确切地说，人类学，其实并不存在。

家中存款资助了我的旅程，当然，比国外大学给的少，比美国电视台付的少更多。我得拿抽奖抽到的机票，在好几个极度不舒服之处留宿，减少独自在外进行田野调查的次数。不过我反而因此安排了比别人更自由的行程，高兴去哪就去哪，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时间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不需要赶回去发表论文。两个月来，我都在安达曼晃，没碰上任何葬礼，真不幸，浪费了这趟旅行，于是我决定再待一个月。其中，我看到一场婚礼，人们和新娘抱头痛哭来恭喜她，他们确实聚在一起大哭，我从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，也没有赶回去发表任何文章。不久后，我发现了两个在半路上哭泣的男人，其实应该说，是他们发现了我。他们的哭声，“这就对了！”——当我一听到声音时，我这样想着，还为了自己的欣喜若狂感到有点难为情，“终于有人死了呢。”我往前靠近，有几个人看着我，我问哪儿在办丧事，他们回答，

没人在办丧事啊！他们是两个多年不见的好友，用这种方式庆祝重逢。我做着笔记，没有继续说话。

几个星期之后，他们住在附近的家人，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庆祝活动。两个邻近的村子，为了争夺一口井而争吵，历经多年的协商后，他们决定签署一个和平协议。来的人差不多有两百位之多，特别是男人和孩子。他们分两边席地而坐，两个村庄的代表趋上前，彼此交换物品：玉米包、工具。然后，他们相互拥抱，就在那一刻，全部的人，全场所有的人，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，我确定，在欧洲绝对找不到一条像这样由泪水汇集成的小河，从不曾有，更别提历史上那些更戏剧化的时期了。这些事情过了快四十年，到现在，我只要一回想起来，全身还是会竖起寒毛。同一个下午，我始终被那股激情感染，无法停止追问眼中所见的景象。我走到荒野踱步思考，半路上，遇上了一群农民，我做了一件早就想做的事情。询问，简单的询问。我叫住其中四个男人，问他们为何要传达一个如此悲惨的哭声。为何他们连开心的事情都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来表达？我的大惊小怪，让他们大呼开心。还没等我开口要求，他们便回答，答案很简单。他们当场证明给我瞧。他们甩开手上的木杖，坐在地上，放任地抽搐大哭起来。那一刻，宛如他们接获了至亲好友死亡的消息。

对他们来说，哭泣是一种参与。如同我们通过握手，建立人际关系。我回来后，把这些见闻发表出来，那些国际重量级学派的有权有势者，非得接受我的论调不可，因为他们无需再浪费两年的时间，在这个无谓的议题上论辩了。我觉得荒谬至极。我只是第一个发现这个事实的人，但很不幸地，我的角色激怒了一些先驱，虽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从来不是沽名钓誉的人。相反地，我始终安于老二的角色。事实证明，这



些哭声源自文化的表达，一种学习的行为，这些论调在今天早就毋庸置疑。

我不是说我的家人不爱我。他们的个性如何，我摸得一清二楚，特别是胡里奥，我一点也没有遗憾。或许，他根本不知道我死了，这个男人多爱我啊！尽管他这样陷害我、尽管我知道他痴呆背后那个真正的原因，我还是如此爱他。自始至终都是，这样深刻的挚爱，导致他杜撰了我的故事。然而，也有可能讣闻还没送出去，或者早传开了，或者他知道以后一分钟就忘了，这样对他来说，也算好事吧。

孩子们都来了。阿尔维托，他一定会恰如其分地为我流下眼泪，不会多一滴，也不会少一滴。倒不是因为他很吝啬，相反地，他要忙着安慰其他人，专心处理那些我死去的琐事，好让别人无须烦恼任何细节。若非必要，他不会承认他的痛苦。我得公平一点：不管阿尔维托是否就是始作俑者，不管至今我仍无法原谅他的错误，我不能否认一个事实：他是好人，比任何人都慷慨，总忙着处理别人的问题。比起以前，我确定他现在更挂念他的儿子路易斯了，一个生病的小男孩。老实说，我不认为十九岁还是小孩子，而且他什么病也没有。也许他的大脑是异常了一点，但是我老嫉妒他。这个世界上，如果有人要对我的死亡说点肺腑之言，我敢说，一定只有他。虽然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

巴勃罗，很糟糕的一个孩子。他满眶的、茫然的、无声的眼泪，恐怕可以弥补阿尔维托所流不出来的泪水。到现在，他铁定还挂着一张癞蛤蟆般的浮肿脸庞。可怜的巴勃罗，我保证，他正像个赶路人似的抽着他的烟。我真想找个理由去看他一眼，或者应该说，假如他看得到我，我会告诉他四件事情：你就别再哭了，深呼吸，别再哭了，看看你自己，看看这张他们给你的